



## 中国精神中国梦 系列随笔之五

# 对话：“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取向

对话人：山东大学教授何中华  
齐鲁晚报记者吉祥



吉祥

习近平总书记选择在十八大后提出“中国梦”，有怎样的深意？又想回应怎样的现实问题？既然“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它如何让老百姓感到真实可及？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又该如何通过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个体梦想的实现创造条件？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中华先生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何中华

名家“半月谈”

## “中国梦”应当怎样筑

程冠军(中央党校《理论网》采编中心主任,学习型政党研究专家)

理解了“中国梦”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认识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描绘了“中国梦”的美好前景,下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60多年的探索,以及近现代170多年的历程总结出来的。这三个历史阶段说明了什么?170多年前是中华民族遭受屈辱的时代,60多年前是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刻,这30多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正因为我们有过往日的辉煌,再遭受到曾经的屈辱,才会有复兴之宏愿。

实现“中国梦”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精神是新时期的中国精神,弘扬这个精神的前提是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今年是真理标准讨论35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周年。30余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不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就会停滞。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重走小平同志的南巡路——到深圳考察,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实现“中国梦”必须建设学习型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学习型政党理论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时代的进步,学习型政党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从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明,学习的目的是学以致用,是通过建设学习型的政党,从而使党成为服务型和创新型的政党,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学习型政党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必须建立正确的、开放的、持续的反馈和反思机制,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挑战自我;第二,必须实现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通过学习提高团队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执行力;第三,必须带着问题学习,在学习中解决团队之间的上下沟通和信息对称的问题。学习型组织里有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故事,说的是一只青蛙跳进温水锅里,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最终被舒服地煮死了。如果我们的党不能成为一个学习型的政党,我们的社会不能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成为学习型的人,我们的“中国梦”很可能被断送在温水锅里。

实现“中国梦”必须杜绝奢靡之风。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之后习近平同志又针对各种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批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所出的从严治党招,也是为“中国梦”的实现所作出的庄严承诺。这个承诺的前提是我们党总结了封建王朝奢靡亡国的历史教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因骄奢淫逸而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民主人士黄炎培所揭示的历史周期率在中国封建时代一再重演,这个历史教训发人深省。因此,不仅要求共产党人要经得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而且,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汲取历史教训,谨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千古遗训,以勤俭精神和忧患意识作为立身之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投身家、国之事业。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同筑“中国梦”、共享“中国梦”。

### 民族梦与个人梦彼此兼容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从历史的角度讲,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一直对梦想进行追求,习总书记选择在十八大后提出“中国梦”,有怎样的深意?又想回应怎样的现实问题?

何中华:我认为,“中国梦”的提出,旨在凝聚共识,凝聚力量,矫正以往在发展中存在的某些偏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住机遇,谋求中华民族的强盛和复兴。作为民族之梦,它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它的实现也离不开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艰苦奋斗和切实努力。民族之梦与个人之梦是彼此兼容的,是相辅相成的。

在我看来,“中国梦”并不能直接解决具体问题,但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现实问题提供目标、方向和动力。光靠物质刺激和利益推动,是不成的。信念的作用不可低估,而且它远比利益驱动来得持久和更富有韧性。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导向和整合作用。它能够引领并规范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而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以成就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肩负的历史任务。

记者:现在的中国,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加之于个人,有的人会觉得梦想似乎很遥远,“中国梦”如何才能不负梦想之名?

何中华:这需要人们一方面脚踏实地,一方面心怀希冀。“中国梦”是有张力结构的,可以说它是一条连接现实与将来的纽带。我们不能这样理解:要么就是一步到位,要么就是与梦想完全无关。老子说得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梦”当然是一种宏伟的愿景,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走向理想境界的现实过程。我们应该善于从动态的角度、过程的角度去领会它,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静止不动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抽象目标和彼岸规定。

应该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博弈性质,使未来的可预期性减弱,甚至挫折感、失落感困扰着今天的人们。问题在于,当下的处境,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免疫力,以抵御加诸我们的压力和风险?如果离开了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我们恰恰会丧失掉最后的防线。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反而是孕育理想主义的温床或土壤。

记者:既然“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它如何让老百姓感到真实可及?

何中华:我觉得这需要从两方面去看。老百姓是最讲究实际的,这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个人如果活得太现实,也是不成的。因为他将永远被束缚在当下难以自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梦”就是让人们用一种超然的情怀去看现实和对待现实。另一个方面,也应该把“中国梦”这个理想目标化作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任务,以便使人们真正感到可以上手、可以诉诸自己的具体行动,可以落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真实就是力量”。“中国梦”只有落实到当下,才能变成真正的力量。

### 消除负能量实现“中国梦”

记者:您认为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有哪些阻力?我们又该如何去化解?

何中华: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只有当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到足够程度的时候才能暴露出来,而且往往是采取井喷的方式集中爆发。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期这一当口,从大的方面说,实现“中国梦”面临的难题包括: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协调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甚至冲突,使得生态和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限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如果没有生态环境的支撑,就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道德的弱化妨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感,它消极地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离开了稳定这个前提,社会发展也难以以为继。人与自我之间的疏离,也使得人们产生了焦虑和无意义感,它直接造成了幸福感的匮乏。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然成为实现“中国梦”的负能量。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着眼。优化自然环境,有赖于人们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利用经济和法律杠杆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力求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优化社会环境,有赖于人们重建信用体系,尽可能恢复社会信任,降低人际交往成本,这样才能使社会达到和谐有序。优化心理环境,则有赖于人们重建理想,过一种有信念的生活。从某个角度看,这些问题每解决一步,也都是迈向“中国梦”目标的一步。

记者: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底层群众无力做梦,既得利益者不需要做梦,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执政党和政府又该如何通过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个体梦想的实现创造条件?

何中华: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对人而言,最不能受到限制的就是自己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保有心灵的自由,乃是人的最大的自由。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有梦想、有追求,就是“取法乎上”。所以,我们每个人总是应该要“取法乎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自我实现。

同时,为每一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是一个健全社会的标志。如何最大限度地遏制社会发展中的“马太效应”,解决社会阶层固化、消解潜规则带来的机会不均,既得利益和特权的存在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能期望个人来承担,因为他既无能力也无责任。它只能通过国家的意志和力量来实现。这方面,不能仅仅局限于理念和口号,更应该落实到制度设计和安排上来。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追求“中国梦”的需要。

### 提出“中国梦”是文化自觉

记者:您也提到,现代化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一个心结。可否这样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梦”也是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梦?

何中华:“中国梦”其实有两个维度,即民族性和时代性。从民族性维度说,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时代性维度说,则是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实现,就谈不上民族复兴;同样地,离开了民族复兴,现代化也将失去主体。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梦,其实早在1860年代就开始了。洋务运动就是第一波现代化尝试,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现代化运动,后来又“逼”出第三波现代化,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回眸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是沿着经济、政治、文化逐步展开的。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始终认为现代化总是有一个开端,始终想找到现代化的“第一因”。殊不知,构成整个社会的诸子系统彼此是相互缠绕的,它们呈现为一个网络结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现代化之殇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走出现代化的这个怪圈。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既是启蒙之路,也是救亡之路。没有启蒙,就不可能在时代意义上拯救中华民族,从而也就谈不上从根本上完成救亡使命。没有救亡,也不可能在民族性维度上拯救中华民族,启蒙也势必会失去依附其上的载体。因此,今天我们应该把民族复兴同现代化内在地统一起来考量。

记者:“美国梦”强调机会公平基础上的个体奋斗,“中国梦”的核心价值或者根基是什么?“中国梦”的提出可否理解为是一种文化自觉?

何中华:如果说西方人强调“己”,那么中国人则强调“群”,它们各有千秋,都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其实,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群己关系应该是互为中介、相互为用的。无论是个体优先还是群体优先,从历史上看都存在一定偏颇,导致负面后果。“中国梦”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一种“合群”,即在保障个体权利基础上捍卫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和神圣性。

应该说,文化的自觉从晚清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在文化受挫的背景下,这种“自觉”表达为文化自卑而不是文化自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特别是现代化本身的局限性的逐步显露,西方人越来越发现以往被他们斥之为落后、愚昧、封闭、停滞之象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包含的拯救的可能性。另外,随着国家对殖民统治的抵制和摆脱,特别是随着国家的独立和逐步富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开始由自卑转向自信。“中国梦”的提出,正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最新形式。

